

NEW DIVIDEND
HOW TO WIN THE NEXT FORTY YEARS

新红利

赢在下一个四十年

滕泰 刘哲 张海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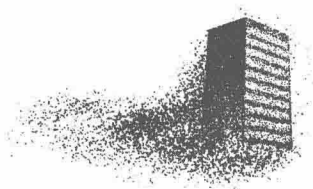
中美贸易摩擦
经济滞胀担忧
传统制造业低迷
房地产“灰犀牛”风险
民间投资持续下滑

.....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政府、企业、个人如何抓住新红利，走出迷局？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NEW DIVIDEND
HOW TO WIN THE NEXT FORTY YEARS

新红利

赢在下一个四十年

滕泰 刘哲 张海冰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 / 滕泰，刘哲，张海冰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207-0900-2

I . ①新… II . ①滕… ②刘… ③张… III . ①中国经济—经济展望—研究
IV . ① F12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0517 号

新红利：赢在下一个四十年

(XIN HONGLI : YING ZAI XIAYIGE SISHI NIAN)

作 者：滕 泰 刘 哲 张海冰

策 划 人：许剑秋

责任编辑：陈丽娜 邹 琪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16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900-2

定 价：49.8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023113

序 言

下一个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新红利在哪里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既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经济转型的经典案例。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经济哲学视角，总结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成功经验，分别指向不同的未来经济模式。而能否正确地总结和介绍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使之对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既关系到中国在下一个四十年能否再现稳定增长的故事，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对世界有所贡献的重要学术问题。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红利的不同经济理论总结

对于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种影响广泛的观点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认为是“中国模式”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奇迹，另一种学术观点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认为存在“中国模式”的学者们对于中国模式特殊性的分析着眼点，也各有不同，例如有人总结中国模式的着眼点，在于中央政府的调控和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其中，强调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既有传统的计划经济派，更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或所谓“政府市场经济学”信奉者；而强调中央政府产业政策重要性的既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传统计划经济者，也包括最近几年林毅

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等学派。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的作用**。坚持这样看法的代表学者如张五常先生，他认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的确，在把GDP作为主要政绩指标的年代里，大部分地方官员都像企业家一样努力，组织各种资源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种种条件。一旦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机制被破坏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大为减弱。

还有如“**胚胎发育论**”则认为中国四十年的增长主要是复制了工业革命，并从经济史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化的各种条件，得出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用政府力量建立了工业化基础，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又在创造和形成统一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有些国内外学者比较重视**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人的储蓄习惯、中国人的勤劳工作作风，以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企业家，才是造成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还有学者把中国经济同印度经济对比，认为过去几十年印度经济增速落后于中国，进而认为**民主体制**并非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有时候甚至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阻碍；或把中国增长奇迹同南美某些国家相对比，从而得出结论，认为金融自由化也未必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与以上中国模式派不同的是“**普世模式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维迎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什么中国模式，而是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和企业精神**，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张维迎教授在《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二百五十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用“中国模式”解释

过去四十年的成就，对内会误导自己，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对外则误导世界，导致对抗。他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在西方眼里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过去四十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张维迎教授认为，很多中国模式理论其实是把“尽管……”当成了“因为……”。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基于这样的逻辑，“普世模式派”对政府调控、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作用等，显然都与中国模式派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他们认为有些国家比如印度虽然具备民主制度的条件，但是没具备别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不支持增长；有的国家由于不具备中国这样的高储蓄条件甚至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操作不当，也不能说明“金融抑制”反而正确。

当然，“普世模式派”的解释也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中国模式真的没有任何特殊性，没有任何值得总结的经验，那么同样拥有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技术沉淀，为什么增长的奇迹没有在印度、俄罗斯、非洲等地发生而仅仅在中国发生？

显然，无论是“中国模式派”，还是“普世模式派”，都有失偏颇。前者过分重视增长的条件，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后者则过分强调了增长的本质，而否定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

二、改革开放如何创造了经济增长红利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四十年，首先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的，是从实事求是、思想的解放开始的。每个改革措施，放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正确选择，都可以作为增长的条件和成功经验来总结介绍，但当初这些改革措施哪一个不是在激烈的争议和分歧中破冰而行？

比如，1978 年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包田到户”，是当初很多人冒着政治风险推动的改革，即便后来得到中央的肯定，成为全国推广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有很多保守力量想不通，认为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倒退行为。直到这种个体生产方式在实践中迅速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并且承包制在乡镇企业和城镇经济推广中也获得良好的实践效果，“万元户”越来越多，类似个体经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才逐步被接受。而一旦承包制、租赁制在实践中遇到一些问题，保守思想就又会抬头。

又比如，1984 年以后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由高尚全先生等人小心谨慎地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和观念上的突破，是多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思想观念突破的开端——在之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虽然总体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但是实践中究竟是市场发挥作用多一点，还是政府的调控多一些这样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某些用行政计划手段干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做法，多次引发争议。

再比如 1986 年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关于价格改革和企业所有制改制的顺序之争，20 世纪 80 年代的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争论以及华生、张维迎等价格“双轨制”理论的提出。从 1987 年价格闯关失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放开粮食价格，逐步放开生活资料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到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大学晏志杰教授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引发理论争鸣，直到现在，涉及人口政策与户籍制度、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土地产权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种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影响着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当然，思想观念冲突最激烈的领域还是所有制之争。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改制过程中的职工下岗转岗的压力，到近几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系引发的争议，可以说，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认识上的突破

还没有完成。尽管民营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是明确的，中央文件也在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但是现实中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确越来越恶劣。一篇否定民营经济的文章居然会引起全国上下民营企业的普遍恐慌情绪，虽然中央及时出来表态，澄清了错误认识，但是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会出现这种论调还是值得深思。至于为什么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投资信心，不仅与原材料成本、地租成本、环保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有关，更有资源配置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例如，为了支持和肯定民营企业，决策者明确强调民营企业为中国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可一个时期以来，在新增贷款总额中民营企业却只占了 30%，究竟是哪些机制上的问题影响了社会资源流向民营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实中在资金、土地、劳动（户籍指标）、原材料、市场准入和产能配额等方面，应该找出那些阻碍了民营企业公平、有效率地获取上述资源的环节和机制，并加以改革。

在涉及国有企业的定位上，原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撰文指出，“当前对国有经济认识误区之一就是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化身或者说是国家的代表，认为国有企业才是执政的基础……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上，国有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太浓，社会责任太重，应该给国企摘帽，使之像民营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竞争”。显然，不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在保守思想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难有突破。

在对外开放方面，深圳特区的成功和它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对整个中国改革的积极影响以及加入 WTO 融入全球市场，都为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不过无论是当初深圳特区实验，还是加入 WTO 艰难谈判等方面，保守思想的怀疑都曾经给对外开放的进程造成压力。比如，当年在深圳特区问题上，有多少老干部当时都想不通，说什么灯红酒绿啊，资本主义啊等等；加入 WTO，有多少人说过这是卖国之类的话？如今再回想起来，这些人自己肯定都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在当时那个特定阶段，这种思想就成为阻碍改革

的保守力量。如今，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新挑战，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保守思想又可能演化出新的形式，如不加以警惕，仍有可能误导中国向着先进生产力发展、向市场经济开放的方向。

四十年来，虽然改革开放一直在破浪前行，但是在这过程的每个阶段，每个问题的实践中，改革思想与保守思想之间都可能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时候自以为是改革开明思想的人，也会在特定阶段、特定问题上认识受限、心里过不去，成为阻碍改革的保守力量。

所以说，历史上有时候影响改革的的确是利益，有时候真的不是利益而仅仅是保守和落后的观念和认识。如果改革之难，不是难在执政者的政治勇气，而是难在落后思想的桎梏，那就更应该认真研究、重新梳理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如何一步步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争取在理念和理论认识上面有新的重大突破，才能在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有更大的成果！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不能说没有形成中国模式，问题是如何总结中国模式。正如刘世锦先生所说，“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革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总体来说，中国模式创造的有利增长条件的确不是那些在影响改革过程中不断被迫退出的调控和干预措施，而是从价格逐步放开到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从所有制和产权方面的条件来看，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是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带来的活力增加，而不是相反；从营商环境条件上，地方官员政绩与经济指标挂钩的竞争机制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法治对行政权力干预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前提下；从对外经贸关系看，则是吸引外资、引进国外技术、不断深度融入世界市场。

因此，从创造更多的增长条件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所有这些成功经验共同点都是“放”而不是“收”：从计划和市场来看，就是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各种管制，反垄断，促进竞争，增加微观活力；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就是简政放权，多激发地方的

积极性；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来看，就是要多激发民企的活力，同时给国有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机制；从对外开放来看，则应该进一步扩大与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

三、中国高速增长红利的本质和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孵化了增长的条件，也不管是什么条件开启了增长过程，经济增长的本质都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在技术进步驱动下的经济成果。

上述经济增长的本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两要素增长模型表示，就是 $Y=AF(K, L)$ ，其中， Y 是潜在 GDP， A 是技术水平， K 和 L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 F 则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本质要么是资本 K 和劳动 L 的投入增加，要么是技术 A 的进步和社会组织方式 F 的变化所致。

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的动力组合：其中制度是增长的条件（precondition），劳动、土地、资本是增长的要素（factors），技术是增长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把制度进步与社会分工变化所带来的增长叫作“斯密—诺斯增长”（Smith–North Growth），把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叫作“库兹涅茨—索洛增长”（Kuznets–Solow Growth），把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叫作“熊彼特—罗默增长”（Schumpeter–Romer Growth）。

比如，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因为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分工变化带来“斯密—诺斯增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短期内其实中国农业的土地、人口、技术都没变，就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变化造成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升。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改革探索，以及全国统一产品市场的形成，改变的既是微观的企业组织模式，也是宏观的社会分工，这就是典型的“斯密—诺斯增长”。中国在这一类型的增长模式中享受了两大红利：一是制度改革红利，二是市场化红利，都是从增长的条件、社会分工角度提供增长动力。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量劳动的投入、大量土地（资源）的投入、大量的资本投入，都可以归纳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库兹涅茨—索洛增长”。中国在这一类型的增长模式中享受了三大红利，即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高储蓄红利。

当然，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每个阶段都兼带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熊彼特—罗默增长”，中国在这种增长模式中既享受了来自西方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也有自主创新的技术红利。

从上述经济增长的本质分析，中国模式派所强调的本质上是解除各种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潜力的增长条件——这固然十分重要，而且未来的深化改革仍有可能继续带来制度改革红利和市场化红利，但是下一个四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储蓄红利、技术红利的确越来越少，劳动、土地、资本的供给结构和供给成本不再如前四十年，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也用过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还能不能重复过去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故事？

显然，如果中国还想再创造下一个四十年的增长故事，唯一的选择就是破除成功幻觉、深刻认识经济增长的本质，分别从增长的条件、要素、驱动力出发，进行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包括但不限于：深化混合所有制、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市场化改革以保持更好的增长条件，持续提高社会分工的效率；同时，进一步深化人口、户籍改革以保持劳动力和人才的供给优势；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降低土地和资源成本；深化金融改革，降低资金供给成本；深化教育、创新体制改革，强化自主创新的技术驱动力……这些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2012 年的时候就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呼吁“供给侧改革”的学术源起。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原本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本质的“供给侧改革”原理，却被个别学术投机者拿去抄袭、炒作，做各种瞎解释，造成了实践中的片面理解。例如一些行政干预市场的供给管理措施也被穿戴上“供给侧改革”的衣帽，结果不但影响了经济效率与公平，而且让很多真正的供给

侧改革措施师出无名而被延误。

四、再造新红利，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既然“普世模式派”和“中国模式派”的胚胎发育论都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是复制了工业革命，那工业革命的本质又是什么？复制完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经济是不是就没戏了？欧、美、日等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增长动力又来自哪里呢？很多人讨论当前是后工业时代，那后工业时代的财富本质又是什么？

其实，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拓展了人类财富的源泉，并改变了财富创造的方式。农业的财富源泉就是地球的表层土壤生态环境，创造财富的方式是利用动植物的繁殖生长的规律，所以农业的财富源泉是上天给定的，创造财富的方式也受到动植物生长时间的限制，因而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工业革命拓展了财富的源泉并改变了财富创造的方式，它把财富源泉从地表土壤拓展到所有地球自然资源，使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摆脱了动植物生长时间的限制，利用各种物理、化学方法任意加工自然资源，这才是工业革命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财富源泉的本质。

从财富源泉的本质的角度，后工业时代是软财富时代，包括软性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传媒产业、金融产业、高端服务业等软产业，其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的思维，挣脱了地球自然资源的限制，满足的也不再是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而是人们的精神需要——这不仅是后工业时代的财富本质，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

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两要素增长模型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五大财富源泉增长动力模型，确切地说只是决定了现在的潜在 GDP，其增长的本质也就是当下的经济增长本质，那么什么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本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就是人类财富源泉和财富创造方式的不断创新，是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的过程。比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乔布斯重新发明了手机，新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才使它走向辉煌。其实，

不止苹果手机，汽车、飞机都是一样的，在没有汽车之前人类就想跑得快，在没有飞机之前人类也想飞，但是只有这种具体的产品或服务被创造出来之后，才会有具体的需求，才会有新的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地出现，不断扩展财富源泉，满足人们之前不能被满足的需求。因而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四十年，不仅要从现有的供给结构和五大财富源泉的增长条件、要素和动力出发，真正深化供给侧改革，同时也要面向未来，鼓励创新，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改变“供给结构老化”的办法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干预那些旧供给，而是用市场化的办法去打造有利于创新的营商环境，去引导刺激新供给，不断升级供给结构，让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让新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行稳致远，就看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五、下一个四十年，需要再造新红利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明治维新，让日本一步一步变为富庶文明的国家；改革开放，则让中国走上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进程。

明治维新始于 1868 年，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不仅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来自中国的儒家和佛教等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一次次深化改革以后，社会稳定而有序，国民心态成熟，进入 21 世纪以来已经连续获得 18 个诺贝尔奖。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同时期开始“洋务运动”，但是由于观念保守、改革不彻底，近代历史连年战乱，人民多灾多难，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直到四十年前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才终于没有错过。

四十年，跟日本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如今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仍然不止一朝一夕。

四十年，对一代人来说不算短，对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则不算长。

在四十年高增长以后，面对着改革红利、要素红利、技术红利的递减，持续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已经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迫切要求。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或民族的复兴，至少都需要百年以上的持续经济增长。

下一个四十年，再造新红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推动改革开放作出自己的贡献，愿我中华早日成为更加富强、更加文明、更加受人尊敬的国家！

滕泰

2019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下一个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新红利在哪里 / 001

第一章 红利褪去的中国经济 / 001

第一节 中国经济的企稳与结构转型 / 003

- 一、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 003
- 二、“去产能”扩大化扭曲供给结构 / 004
- 三、从“金融收缩”到“金融扩张”的时滞 / 005
- 四、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与风险点 / 007
- 五、经济阶段性企稳的前提条件 / 008

第二节 中国会不会上演“失去的 20 年” / 009

- 一、中国经济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 / 009
- 二、会不会上演“失去的 20 年”关键看国内改革能否再造新红利 / 010

第三节 中国经济会“滞胀”么 / 013

- 一、中国经济有“滞”无“胀” / 014
- 二、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实际影响小于直观现象 / 014
- 三、成本上升若不冲击物价，必然冲击投资 / 015

第四节 影响民间投资的深层次原因 / 017

- 一、企业的发展很难独立于宏观环境 / 017
- 二、各种成本持续上升 / 018
- 三、断贷与融资成本冲击 / 020

第五节 当总需求刺激效应递减 / 022

- 一、需求管理的思想由来——从西斯蒙第到凯恩斯 / 022
- 二、中国的需求管理政策 / 023
- 三、总需求刺激效应递减 / 024

第六节 中国经济周期的复杂性与新特点 / 027

- 一、新时期经济周期的复杂性与新特点 / 027
- 二、决定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是供给结构的变化 / 028
- 三、中国本轮经济下行的本质原因：供给结构老化 / 029

第二章 再造新红利，观念先突破 / 033

第一节 互联网和金融是否创造财富 / 035

- 一、新“大帽子”——子虚乌有的“虚拟经济” / 035
- 二、新实体经济——从反击、防御到逃跑、出卖 / 036
- 三、软价值时代——切勿用昨天的理论管理今天 / 038

第二节 软财富的新源泉和价值新规律 / 042

- 一、软财富的新源泉 / 042
- 二、如何衡量软价值 / 044

第三节 把握新经济的软性特征，创造软价值 / 047

- 一、新经济的软性特征 / 047
- 二、有效价值投入因子：软价值的第一个创造阶段 / 048
- 三、传播群体广度和软价值乘数：软价值的第二个创造阶段 / 050
- 四、软价值实现的弯曲路径 / 051

第四节 软资源——抢占全球价值创造制高点 / 053

- 一、新时代全球财富创造和分配的主导要素 / 053
- 二、如何培育软资源，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 055

第五节 以人民为中心，从国富到民富 / 057

- 一、福利原则：财富越向民营和家庭部门倾斜，人民福利越高 / 057
- 二、效率原则：利益越直接，财富增长效率越高 / 058
- 三、二战以前的全球财富结构：以民营企业 and 家庭所有为主 / 060
- 四、二战后国有财富的扩张及影响 / 061
- 五、以人民为中心，追求民富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 063

第六节 深化产权改革的认知前提 / 065

- 一、如果瓜分他人财富“天经地义”，谁还去创造新财富 / 065
- 二、不尊重私有财产权，必然陷入产权改革陷阱 / 068

第三章 借力新经济，创造新红利，跳出传统经营困局 / 071

第一节 软性制造——重新定义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道 / 073

- 一、软性制造：新时代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大趋势 / 073
- 二、制造业的商品软价值系数 / 075
- 三、软性制造：重新定义制造业，满足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 / 076
- 四、实施软性制造战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道 / 077

第二节 软价值战略——美国从贸易逆差中赚取利益的秘密 / 079

- 一、中国只赚顺差，而美国公司赚钱 / 079
- 二、硬价值企业困难，软性制造赚钱 / 080
- 三、软性制造的两阶段 / 080
- 四、学习美国企业提升软价值 / 081

第三节 软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选择 / 084

- 一、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与产业结构的新特点 / 084
- 二、软硬产业的“八二定律”：挣脱自然资源束缚的经济发展新趋势 / 085